蔣經國以親身經歷看透共產黨

文丨傅龍山

蔣經國十五歲的時候赴蘇留學，在蘇聯因親身經驗看透了共產黨的殘酷及統戰手段，讓他後來在臺灣主政時堅持「不談判、不接觸、不妥協」的反共立場，毫不動搖。

在二十世紀中國大陸與臺灣的政治人物中，蔣經國的人生軌跡有一種特殊的弔詭：他是留學蘇聯十二年、娶了俄羅斯妻子、曾經公開與父親決裂、一度是托洛斯基思想信徒的「赤色青年」，卻在返回中國、遷徙臺灣之後，成爲國民政府情治系統的實際掌舵者，是臺灣戰後最堅定、也最難被中共動搖的反共者之一。

這個轉變不是憑空發生的。蔣經國的反共，不是書齋裡讀來的意識形態，而是 12 年蘇聯歲月裡，用身體、用青春、用被拋棄與被監視的恐懼親身換來的認識。

他所理解的中共與蘇共，不是宣傳文件裡「解放全人類」的理想圖景，而是一整套可以隨時翻臉、隨時把最親近的同志送上刑場的權力機器。

正因爲這份認識是刻在骨子裡的，而不是聽來、讀來的，他後來才格外難以被中共的統戰話術、和談姿態所迷惑——他太清楚那套語言背後可能藏著甚麼。


公有領域

1937年4月，蔣經國由蘇聯返回中國後在漢口與父親蔣介石合影。

赴蘇被送作人質的少年

1925 年，年僅十五歲的蔣經國告別上海，經北京、廣州，最終遠赴莫斯科中山大學求學。這趟旅程的起點，本身就帶著政治算計的陰影：

孫中山逝世後，國民黨內部陷入權力鬥爭，蔣介石當時掌握部分軍權，卻不被與國民黨合作的共產國際所信任。將親生兒子送往蘇聯，某種程度上正是蔣介石用來換取共產國際信任的政治籌碼——蔣經國從少年時代起，便是父親政治布局中的一枚棋子，而非單純的留學生。

這個「人質」身分，在 1927 年蔣介石發動清黨、國共決裂之後變得無比現實。蔣經國一夕之間從「紅色將軍之子」變成蘇聯手中的政治人質，他被迫公開發表聲明與父親「決裂」，此後在蘇聯的處境急轉直下——升學、工作分配、行動自由，全部繫於他在政治上是否「聽話」。

一個十七、八歲的少年，必須在異國他鄉獨自面對這種被父親的政治抉擇所連累、被整個國家機器操弄命運的處境。

這段經歷帶給他的，是一種近乎本能的警覺：對共產國際、對蘇共而言，一個人的價值只在於他能不能被當作籌碼使用，一旦失去利用價值，隨時可以被犧牲。這種認識，日後成爲他判斷中共任何示好、任何統戰姿態時，內心最深層的懷疑基準——他知道，在那套體系裡，善意與承諾從來都是可以隨時撤回的工具，而不是眞心。

因為「托派」被整肅

蔣經國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求學期間，曾一度傾心托洛斯基主義，這並非特例——中山大學本身正是當時托派思想在中國留學生圈中的重要據點。然而，當史達林在黨內鬥爭中擊敗托洛斯基、展開全面整肅之後，這所學校也未能倖免。

他親眼看著自己所崇拜的思想陣營一夕崩解：支持托派的同學好友被蘇聯秘密警察逮捕，有人甚至因此喪命；校長遭到整肅；爲數不少的中國留學生被送進集中營或發配勞改，其中一部分人被押往西伯利亞的金礦區做苦工。

蔣經國自己雖然逃過了最嚴厲的處置，但代價同樣沉重，而且逃過整肅的原因本身就極具諷刺意味。據部分史料記載，當時中共駐莫斯科代表王明一度試圖將他打成「托派」加以整肅，是史達林基於將他視爲對蔣介石的「人質」這層政治考量，才將他保護下來。

也就是說，讓他免於一死的，不是組織的溫情或信任，而是他作爲人質仍有剩餘利用價值的冷酷計算。這正是他一生中最深刻的一堂課：在這套體制裡，連「被赦免」都不是出於人性的憐憫，而是另一種形式的算計與利用。

他被迫公開退出左派活動，簽署聲明放棄托派思想，此後行動、通信都長期受到監控，甚至連寫信的自由都被剝奪。

下放西伯利亞勞改

更直接的身體記憶，來自他被下放勞動的歲月：1932 年他被派往西伯利亞一處小火車站當搬運工，隨後又轉往阿爾泰邊疆區的金礦工作，在飢寒交迫中度過近九個月，其間一度臥病；後來又輾轉到烏拉爾重型機械廠做工。

他自己後來在回憶文章〈我在蘇聯的生活〉中，記錄了被派駐西伯利亞集體農莊時的經歷——如何在一個對他充滿敵意的農村裡，從被視爲「只會吃麵包不會做工的人」，到透過與當地有威望的老農夫同耕共作、逐步建立信任的過程。

這篇文字看似平淡的生活紀事，底層卻是一整段被迫離鄉背井、寄人籬下、隨時可能再度被發配他處的漂泊歲月。

這種親歷整肅與下放的經驗，帶給蔣經國的認識，不是理論宣傳所能給予的。理論可以說服人相信一套制度的邪惡，但只有親身經歷過同志一夜之間變成階下囚、朋友一夕之間人間蒸發、自己的生死安危完全取決於他人政治算計的人，才會眞正明白：這套體制的殘酷，不是偶發的暴行，而是它運作的常態；它對「人」的看待方式，從根本上就是非人性的——人不是目的，只是達成鬥爭目標的手段。

這份認識一旦刻進骨子裡，就很難再被任何漂亮的話術動搖。

1937 年，在中國政府的要求下蘇聯同意讓蔣經國回國。 3 月 25 日，蔣經國帶著俄籍夫人瓦赫列娃（蔣方良）、兒子蔣孝文，離開了蘇聯，踏上回國旅程，結束他長達十二年旅蘇生涯。

見過地獄的人 不再被畫皮所騙

蔣經國後來在臺灣主導情治系統，並堅持「不談判、不妥協、不接觸」的反共立場，甚至在晚年兩岸關係逐漸解凍的氛圍中，仍對中共的統戰攻勢抱持高度戒心——這種近乎頑固的警惕性，其根源不在於意識形態的教條，而在於一份無比切身的生存記憶。

同時代不少政治人物，包括國民黨內部的一些曾與中共談判、周旋的人物，往往因爲缺乏這種第一手的體制經驗，容易被中共的和談姿態、統一戰線話術所迷惑，甚至一步步被牽著鼻子走，最終陷入對方精心布局的政治陷阱而不自知。

蔣經國之所以很難被這樣玩弄於股掌之間，正是因爲他早已在青少年時期，就被迫親眼見證、親身經歷過這套體制如何對待「自己人」：連他這樣一個被史達林當作籌碼利用、留下活口的人質，都要眼睜睜看著身邊的同志、朋友、師長一個接一個被清算、被送上刑場、被發配到冰天雪地裡自生自滅。他明白，在那套邏輯裡，沒有任何一個人是眞正安全的，包括他自己在內——區別只在於，你此刻對掌權者還有沒有利用價值。

這種認識帶給他的，不是一套可以言傳的理論，而是一種深植於身體記憶的免疫力。當中共後來以「和平統一」、「一國兩制」等語言展開統戰攻勢時，蔣經國所看到的，不會只是字面上的善意，而是他十二年蘇聯歲月裡反覆驗證過的那套邏輯的又一次重演——承諾可以隨時收回，善意背後往往藏著算計，而所謂「同志情誼」，在權力鬥爭面前不堪一擊。

正因爲他曾經活在那套體制的核心地帶、親身承受過它的殘酷，他才擁有其他政治人物少有的辨識能力：一眼看穿糖衣底下的眞實邏輯，而不會被表面的和緩姿態所軟化。

可以說，蔣經國一生中最堅硬的政治資產，不是他的權位或人脈，而是這份用青春與苦難換來的、對中共體制本質不會再抱幻想的清醒認識——這份清醒，是任何統戰話術都難以攻破的心理防線。


公有領域

1939年，蔣經國攜夫人和長子赴江西就任贛南行署專員。

經典名句

少年易老學難成 一寸光陰不可輕

文/林婉如

少年易老學難成，
一寸光陰不可輕。
未覺池塘春草夢，
階前梧葉已秋聲。

這是南宋的著名理學家朱熹的〈勸學〉詩。

晚年時，朱熹與門人在江西新城福山（今黎川縣）雙林寺一帶講學，在講學之餘有所感觸而吟成此詩，其中，「少年易老學難成，一寸光陰不可輕」廣受大家喜愛。人們常用它來勸誡年輕人，要珍惜時光、努力向學。

朱熹〈勸學〉勉人向學

〈勸學〉全詩直白易懂，朱熹以親身經驗告誡青年，人生短短幾十年，稍縱即逝，而學問、事業不是一蹴而就，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才能達成。

後兩句則用春日美夢未醒、臺階前梧桐落葉已響起秋聲的強烈對比，具象化歲月如梭的感慨，用以勉勵青年。

「少年易老學難成，一寸光陰不可輕」是該詩的名句，經常被人們引用。

他告誡人們，青春的日子容易逝去，學問卻很難成功，所以要珍視光陰，努力向學，將來才不會因虛度年華而悔恨，不因碌碌無爲而蹉跎人生。

孔子勤學的故事

古人勤學的故事多得數不勝數，其中，孔子因努力學習而「廢寢忘食」的精神，尤其值得大家效仿。

眾所周知，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教育家，也是儒家的創始人。孔子年老時，開始周遊列國，有一年，他來到趙國的葉邑，葉縣大夫沈諸梁熱情地接待孔子。

沈諸梁聽說孔子是個有名的教育家，教出許多優秀的學生，但他對孔子本人並不十分瞭解，於是他向孔子的學生子路打聽孔子的爲人。

子路雖然跟隨孔子多年，但一時間卻不知怎麼回答，就沒有作聲。之後，孔子知道了這件事，就對子路說：「你爲甚麼不回答他：孔子的爲人呀，努力學習而不厭倦，甚至於忘了吃飯……這樣的話呢？」孔子努力學習的態度，至今依舊根植於人們的心中。


公共領域

南宋理學家朱熹肖像。為清末至民初無名氏所繪《名賢肖像》冊頁之一，現藏美國費城藝術博物館。

古人努力向學且修身養性

古人求學的目的與今人爲了增強競爭力而學習的目的有所不同，相反的，古人學習的目的，是爲了修養自己，使自己成爲有高尚情操的君子。

荀子〈勸學篇〉就提到：「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，則知明而行無過矣。」「積善成德，而神明自得，聖心備焉。」他認爲，君子只有廣泛地學習，每天省察自己，才會積善成德，見識高明，行爲不會出錯。他的這段話告訴我們，培養道德操守、涵養君子人格才是學習的眞正目標。







